



李正宇学术文集①  
LI ZHENGYU  
XUESHU WENJI 1

#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GUBEN DUNHUANG XIANGTUZHI  
BAZHONG JIANZHENG

沙州图经卷第一 /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 沙州图经卷第五 / 沙州志 /  
沙州伊州志 / 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 / 敦煌录 / 寿昌县地境 /

李正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WWW.GSRMCBS.COM

李正宇学术文集 ①

LIZHENGYU XUESHU

WENJI

GUBEN DUNHUANG XIANGTUZHI

BAZHONG JIANZHENG

#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李正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 李正宇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26-03560-3

I. 古… II. 李… III. ①敦煌市—地方志—古代②敦煌学—历史地理—考证 IV. K294.23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1789号

责任编辑: 郝 军

封面设计: 马吉庆

##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李正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5 插页 6 字数 407 千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978-7-226-03560-3 定价: 52.00 元

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

送坐題



## 序 一

敦煌地处甘肃西部，古来为西域门户。其千佛石窟叫莫高窟，夙为中外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更于20世纪初发现藏经洞中约九百年封藏的大量古写经和文物，于此内外生长了敦煌学。近年中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其研究日趋隆盛，年年刊出不少专著，其研究对象颇为广泛，已成一门显学。

然而，敦煌固为边疆的城市，地距中原几千里，虽然尝为丝绸之路上要冲，后来却长期沦为被忘却的僻邑，因兹关于敦煌之地理记述既少且略。幸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有几种古代敦煌地志残卷，已为学界注意并加以研究。郑炳林氏《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搜罗沙州、伊州、西州地区残地志9件，敦煌地理杂文书11件，全国性地志4件，往西域行纪7件，往五台山行纪6件，姓氏地理文书5件，一共42件，辑录而加校订注释，提供丰富材料之功不可没。唐耕耦氏《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1986年）亦辑录敦煌地志17种，图版录文并举，甚便于阅读利用者。饶宗颐氏《敦煌书法丛刊》十二、十八册中已包含《沙州图经》（P.2005）《沙州城土境》（P.2691）之影印件，图版精良而完全原大尺寸，仿佛原卷面貌，又附饶氏解说，文虽简而新见不少。

李正宇先生之新著笺证，辑录八种敦煌地志，影印和录文并载，更分条阐释，详加考证，大约730余条，其中若干条可谓专论之要约，其详密和精辟颇使读者赞叹。本书附载的玉门道和阳关道示意图、唐第五道（莫贺延碛道）及稍竿道驿址里程示意图、敦煌绿洲渠系图、都乡渠壅水七里示意图、敦煌塞城及存毁情形示意图、沙州诸山位置图、蒲昌海周围诸城

镇位置里程示意图等，皆为著者多年考察现地古址的成果，一览而可略窥古代敦煌之地域特征，其功无限。

李先生自1982年以来，在敦煌研究院（旧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先生固精小学和文献学，亦努力跋涉瓜沙各地，调查古代城障和住址遗迹，时时步踏探查，已有不少发现。例如关于塞城，发现了敦煌塞城遗址（西北残段十余里，东南残段二里余）及其筑造规制，又找到寿昌城南面的塞城残址，可印证沙州图经记载，更发现寿昌城东及西面塞城遗址。因兹著者判断塞城为回绕敦煌、寿昌二县农田之垣墙，此说对于理解边地防卫启发处良多。又详加检讨瓜沙南北二驿道及瓜伊驿道驿址之所在，注示其今时地望坐标。或者关于沙州诸山如黄釜、猛水、南口、硖石、会道、石泉、大乌、石槽、望、金鞍（龙勒）、无穷、黄谷诸山，俱不明今为何山，而著者根据地志之记载，参酌当地山脉分布及踏查所得，一一作了比定。这种作业前人到底所不能企求，俟著者的明敏识见和不辞辛劳才得实现。

其他，著者介绍敦煌吕钟氏所抄《寿昌县地境》，比向达氏录文更为接近原抄本；又关于诸卷原文之校勘，本书拈出前人失校者颇多，如《沙州都督府图经》北府渠条“中河斗门”，校改作“平河斗门”，三丈渠条“河斗门”，校补作“平河斗门”，是著者对于敦煌河渠资料进行全面清理、综合分析之后作出的成果。更细心改订了先学释所未当处，如《元和志》释龙勒水为李陵徘徊观虏处之浚稽山南龙勒水，而本书指出，李陵所至之浚稽山在张掖东北，非龙勒县（后之寿昌县）南之龙勒山下龙勒水。或关于河仓城，斯坦因（A.stein）定在大方盘城，今人亦多从之。本书则论证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河仓城之所在尚待寻找。又如《沙州图经》之“一所殿”，罗振玉氏解为李嵩薨处之光德殿，本书则指出，嵩薨于酒泉，光德殿当在酒泉，而非敦煌之恭德殿，此类贡献不遑枚举。

笔者于1985年乌鲁木齐开会时始得拜眉李先生，其后屡蒙惠赠新作教示，受益匪浅。笔者平常推服其所论精细，实事求是。而今值本书刊行，先生特征序言，笔者喜其公刊一定嘉惠学林，不揣浅学不文，略述其内容为序。

池田温

1992年11月于北京

## 序 二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一书所收唐五代敦煌地志八种，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人文、风物的基本文献。它的内容涉及敦煌学的许多学科门类，诸如古代的敦煌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学、军防、交通、农业、水利、名胜古迹等，因而引起敦煌学界、方志学界和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在敦煌遗书中，成为阅读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品种之一。它所记之地，所述之事，所传之人，由于年远时迈，逝之者已渺无影踪，残留者复见而难识；加之写本句残字泐，舛讹错简，承乖导谬，使读者颇难把握理会。至于沟通古今，见此知彼，即使专家，亦颇棘手。因此，又成为敦煌遗书中问题较多、颇难索解的品种之一。

近八十年来，我国、日本、英国、法国曾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少。本书著者李正宇先生，长期工作在设在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着意于敦煌古今历史地理迁变之探究，在精研前辈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敦煌地志所记，常辅之以实地考察，力求将文献记载与今时状况互相印证，彼此沟通。既见人所未见，又发人所未发，于敦煌地理创获良多。所撰笺证，既荟萃了前人研究之精华，又贯串了著者之新见；徵古检今，抉隐发微，其深度和广度，在近年来敦煌地志的研究中堪称精品，着实是一部高水平的专著。

本书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下列诸方面：

- 一、对八种古敦煌志的编纂、抄写年代及其源流作了系统的考订；
- 二、对抄本的衍脱舛讹作了进一步的校勘及残缺文字的推补复原；
- 三、对古地作了证古通今之考订与比定；

四、对古事进行了考信与辨伪；

五、对八种卷本之间以及八种卷本与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和内容，作了贯通与印证。

今撮其尤要者略作一点介绍：

1. 关于诸卷源流的考订。本书将八个卷子划分为五个系统，即S.2593、P.2005、P.5034为同一系统；S.788、S.367为同一系统；其他三卷即P.2691、S.5448及《寿昌县地境》各为一个系统。在认识诸卷源流、辨别体例异同方面较前大大推进。

池田温先生最先将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及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列为同一系统。本书在肯定池田氏论点后，还认为其中S.2593与P.5034为此一系统原本的残抄件；对S.2593及P.5034，根据《沙州图经》之卷名，以及原卷“属凉州都督府管”的说明，推断其编写年代在咸亨元年到景云元年（公元670—710年）之间；更据P.2005新井、广显、乌山驿条“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之语，取严耕望先生之考证，进一步落实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作者又指出上述二卷皆未涉武后以降之事，且引P.5034写卷中残留有武周新字以为旁证，递进收缩，本证及旁证兼举，终于将二卷之编撰年代具体落实，堪为定论矣。

至于P.2005，池田温先生考证为永泰年代之增修本，本书则是而从之。

对S.788《沙州志》和S.367《沙州伊州志》，本书定为晚唐纂本，又通过对二本所涉“大中”纪事，以及体例、列目之分析，得出原属一书的结论。继又指出S.788卷子特有的“欠xx”之为批注性质并揭示其欲补意图，可为本卷一扫疑云。

对P.2691号卷，已往由于认识不一，拟名亦有不同。近年来，学者多拟名作《沙州城土镜》。本书则提出新说，指出“沙州城土镜”只是记述州城方位及州境四至的一个条目，并非本卷卷名；根据本卷“至今大汉乾祐二年”之语及其兼涉瓜沙二州之地及其略抄性质，改拟其名为《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又根据卷内“说别有本”之语，推断原“本”当是《沙州归义军图经》。

关于S.5448《敦煌录》，本卷则揭示了以地系事，重在述事的特点，指

出本卷与上述图经、州志皆不同，应为另一系统的乡土志书。

关于《寿昌县地境》，本书首次提出了对编撰时间、材料来源以及名称由来的推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介绍并公开刊布了罕为人知的另一录本——敦煌举人吕钟氏的转录本。此本同向达先生转录本相比，有30多处不同，当更接近原卷。这无疑使学术界又多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2. 关于诸卷校勘及残缺文字的推补复原。从罗振玉氏起，这个工作已经进行了八十多年，明显的衍脱舛讹多已校出，漏掉的不算太多；但仍有少部分从前人眼皮下面多次漏网，这部分恰恰是隐蔽最深，最难发现者，若非博览敦煌文献、深悉敦煌乡土掌故并且十分细心的人，则很难加以识别剔出。例如P.2005卷北府渠条“中河斗门”，本书校作“平河斗门”，三文渠条“河斗门”，本书补作“平河斗门”，非博综敦煌地理文献，全面清理敦煌古代河渠资料者难作此校，更难正其本名。以上两处，诸家皆失校，盖因对敦煌河渠文献未作全面董理，对敦煌古代河渠名称、位置不甚了然之故。又如“一所殿”条，原抄作“高四尺”，本书则据其“六门，五架……东西十七步，南北八步”之规模，参以房舍殿堂之一般规制，指出“其高必不止四尺。王者听政之殿，若仅四尺之高，人人之且不能直立，岂有是理？疑当是‘四丈’之讹。”此说，足以正原文之讹，兼补后世诸家之漏校。又如同卷“蒲昌海五色”条“河谦海夷”，“谦”字亦自来失校，本书据《礼斗威仪》“其政太平则河谦”及宋均注与《宋书·符瑞志下》侯演之《嘉禾颂》、《乐府诗集》卷十唐太庙乐章《崇德舞辞》以证其字当作“谦”。同卷“歌谣”条“皷鼓不胜”，本书据《小雅·鼓钟》、《大雅·绵》、《周礼·考工记》及《龙龕手镜》等书，释为“皋鼓”。凡此，皆非得来不费工夫者。又如P.5034，S.788、P.2691及《寿昌县地境》皆载玉门关距寿昌城“一百六十里”，本书根据实际里距，指出诸卷所载里数有误，又以《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舆地广记》皆作“一百十八里”校之，判断诸卷“六”字当为“六”之讹，其下更妄增“十”字，遂讹为“一百六十里”。若非身履步踏、博参综稽，何可破此疑案。又《寿昌县地境》记故屯城“在石城西北”，诸家既未究此城所在，又未与P.5034及S.367两卷之同项记述相印证，故皆漏校，独此书校作“在屯城西北”，亦发前人之所未发。

3. 关于古地之证古与通今，是古敦煌志研究中甚关紧要而又难度较大的问题。本书对于敦煌古代城堡、关塞、山峦、烽燧、驿道、河渠、泉泽位置之考订，收获尤多，成为本书突出的特点。我国古学，有不少可以关在书斋里下功夫，而地理之学则非走出书斋亲身踏察不可，否则，文献与实地终是互相隔膜的两张皮。元、明两代，敦煌原有居民外迁，旧时地名率皆失传，故敦煌旧迹所在，皆须重加考订。自清代重新疆理敦煌以来，二百多年间时有学者从事研究，然而除沙州城、寿昌城、鸣沙山、三危山、悬泉等少数旧地得到认定之外，其余大多不知其处。本书撰者身居敦煌，熟悉敦煌地形、地貌及古代遗址，又勤于踏察，通过察形验迹，探其古今变迁，创获良多。例如驳证大方盘城之非河仓城，判断风墙子之为古塞城，考证石门涧、石门谷、石门山、石门烽及渥洼水旧址之所在，比定二十多个驿所之故址等，若不熟悉敦煌地理，岂能开此锈锁。1987—1988年本书撰者发表《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已指出古塞城是围绕敦煌绿洲的垣墙。今于本书中，对古塞城作了专条笺证。当地耆老，或传古塞城为“秦始皇长城”，或称挡风沙的“风墙子”；考古工作者则判断为汉长城支线，皆不悟为塞城。本书撰者通过考察，判断为古塞城，并论证为“环绕州城绿洲之屏障，以护卫居民及田畜之安全”。至此，古塞城之遗迹方得认定，而古塞城之性质与作用亦得到揭示。P.2005卷记塞城四至云：“北在城北五里”。诸家皆未发现其误。本书撰者参诸《法显传》所载，又依据踏察所得，指出“五”前当脱“卅”字，勘正为“城北卅五里”。设使起古人于地下，亦当首肯心仪。又如寿昌县石门涧，近人皆指为敦煌市南湖乡山水沟，本书作者独疑此说与文献记载不符，乃多次往其地踏察，终于找到了久已湮没的石门涧故址。同时，以石门涧之考订为立足点，顺理成章地弄清了石门谷、石门山、石门烽等一系列以“石门”冠名的古址，既落实了文献记载，又纠正了前人之失误。

4. 关于古事之考信与辨误，是敦煌志研究的另一课题。例如P.2005卷末所载《歌谣》，近年来学界认识上颇有分歧。有的根据篇末识语认为是“地地道道的唐代初期民间歌谣”，并肯定了它“来自民间的真实性和它的价值”；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是一些谄诈的作品，并非流行于民间之歌谣”，“所谓‘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不过借口百姓为歌颂之由而已”。本书则

通过笺证，揭出了歌谣屡屡袭用或化用《诗经》语典及其出处，并指出篇末识语所谓“载初元年（公元689年）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的不实，又指出歌谣述及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收复四镇及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重建明堂等后来事，诚为当时文人作伪假托之铁证。又如鸣沙山之鸣响，虽古人屡有所记，而后人多疑其子虚乌有，本书则介绍了1990年5月28日敦煌民俗学会组织的滑沙引鸣实验活动（正宇时任敦煌民俗学会会长，为此次活动组织者之一），载其声级测试的数据54~82.5分贝，足为设疑者释疑矣。

5. 关于敦煌志诸卷与其他古文献的贯通印证，是本书的又一特点。敦煌古代城堡有“北府城”，灌渠有“北府渠”，姓氏有“北府张”，村庄有“北府庄”，皆以“北府”冠名。P.2005卷北府渠条云“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然而何谓“北府”，未加说明，今人莫知其解。本书根据《后汉书·班勇传》、《西域传》、《元和郡县志·伊州志总叙》及《敦煌名族志》与P.2005号卷的记载，互相参证，彼此贯通，论证“北府”为东汉及魏晋“寄理敦煌北界”的护西域副校尉府或伊吾司马府。立论新颖，言之有理。尽管原址尚有待考证，但“北府”之解从无到有，至少得谓前进一步。此外，如断独利河为疏勒河；辨都乡河即都乡渠而非党河；论P.2005号卷“监牧”下23条空列其目之缘由；证诸家校蒲昌海距玉门阳关“千三百里”之未当。凡此种种，皆得于诸种文献之贯通印证，非徒作空言。由于这类问题涉及传统文献之校勘及后世研究之是非，所以它的意义又超出了敦煌一地的局限，而具有一般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的意义。

敦煌文献，如同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一样，同是祖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了学习、了解、研究这些遗产，我曾八次朝拜了莫高窟和设在那里的敦煌研究院。每次去学习，总是有所收获。然而，面对巍巍三危山，身临茫茫阳关道，常有慨于关山之沧桑，难寻其历史之故迹。今有正宇先生的实勘笺证，则疑团顿释。豁然开朗之余，欣然为之序。

陈国灿

1992年11月于珞珈山

## 序 三

李正宇先生的新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即将问世,这是作者奉献给敦煌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十分值得庆贺。

我是学历史地理出身的,曾师从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专攻西北历史地理;在敦煌学领域主要从事瓜沙史地研究,这方面李正宇先生可谓我的良师和学长,每每向李先生请教,获益良多。由我这个后学者写序,实在是愧不敢当。但作者十分谦虚诚恳,又特别关怀提携后学,几次囑言,就不便推辞了。不敢叫什么“序言”,就略谈一点体会吧。

敦煌地志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地理学、方志学的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据史料记载,至迟不晚于西汉,而盛于唐宋,再盛于明清。早在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隋书·经籍志》)。早期的方志著作以异物志、风土记、山川图记、州郡地记等为主体。如晋人挚虞的《畿服经》、阚骃的《十三州志》、南齐陆澄的《地理书》、陈时顾野王的《舆地志》等。隋代编出了《诸州图经》、《区宇图志》等鸿篇巨制。到了唐代,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种方志著作的纂修大盛,就其种类而言,就有“图经”(如《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图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图”(如《十道图》十卷)、“志”、“地志”(如《括地志》五五〇卷)、“书”(如《蛮书》十卷)、“录”(如《贞元十道录》、《南诏录》)、“记”(如《扬州记》七卷、《闽中记》十卷)等,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五代、宋代,继唐之遗风,修志方兴未艾,并出现了“地境”、“土镜”、“路境”一类的新志书(如《寿昌县地境》、《沙州城土

镜》、《西天路境》等)。敦煌地志文书均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反映了我国唐宋修志盛期方志著作的面貌,在我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拿《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几个卷子来说,可使我们一睹唐代图经的原貌,它们较以前所见传世最早的图经作品——北宋末年的《四朝图经》、《严州图经》等还要早四个世纪,从而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据之,方志学界的若干误说谬传可得以纠正(参见拙著《唐代图经蠡测》,载西北师大《敦煌学研究》,1986年)。敦煌地志文书叙事详确,内容盈实,保存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史料,这对于研究唐五代时期敦煌乃至西北边地的历史、社会、地理、交通、经济、宗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所记敦煌郡城、河仓城、效谷城、古长城、古塞城、阳关、玉门关、寿昌城、瓜州城、常乐城、悬泉城,以及古楼兰地区的石城、屯城、新城、葡萄城、萨毗城、鄯善城、故屯城、播仙镇等,详实可靠,较之正史有关内容要丰富确切得多,这对于考证这些古城址位置,进而探讨西北干旱区古代城址起源、布局及城镇体系的形成演变规律极有助益。又如P.2005专列“十九所驿”一节,详细记述沙州所辖诸驿、驿道位置及设置情况;P.5034则记述了古楼兰石城镇通往各处的六条道路,详载各道走向、里程、途中有无水草井泉、路况是否险峻、什么季节能够通行等情况。这些材料较正史《地理志》、《外夷传》等更为具体生动,不仅对于研究丝路古道弥足珍贵,而且还为我们探讨沿途自然环境的今古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敦煌地志文书从其发现之初,就引起学界的轰动和广泛瞩目,我国、日本和法国一些学者曾对其作过若干辑录、整理、校勘、介绍或考证方面的工作。李正宇先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并融入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瓜沙史地的大量成果,对其作了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研究、笺证。李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特别注重实地调查,学风严谨,无征不信,一丝不苟,书中笺证考释700余条,有许多独到精辟的学术见解,做出了多方面的突出的学术贡献。关于李先生在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贡献,依我之浅见,可概括如下:

1. 对敦煌唐宋时代的河流渠道、湖泽水系做了系统的辑录和深入研究。李先生依据160多件敦煌文书及其他史料,爬梳整理又实地踏察,尽可能根据地貌、地形、其他地表遗迹和航测地图等加以验证修订,在此基

础上，钩稽出唐宋时代沙州敦煌县、寿昌县河渠泉泽及堰坝斗门等百余所的概貌，并据以编绘出相应的河渠分布及诸乡位置示意图。其中对文书的误载和前人研究欠当处多有修正。由这一研究，不仅可展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成就，而且可据之进一步探讨当时敦煌农田分布、城村设置、烽戍布署、道路交通、诸乡区划，以及寺观、冢墓的追寻访踪等等，对于研究敦煌古代户籍、田籍、契券、碑铭、传赞、诗文所涉及的丰富的历史地理内容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河渠水道的准确定位可作为打开敦煌古代地理状况的一把钥匙。

2. 对于敦煌古城、敦煌大方盘城等古城址作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李先生就敦煌城的创修，汉、十六国、唐、宋各个时代敦煌城（沙州城）的结构布局、形制、规模、子城、罗城、街巷分布、坊的划分、衙署、殿堂、馆、仓、寺院、店铺的设置、城外羊马城、壕堑等状况，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文书史料，并辅以实地调查印证，作了科学的考察，复原了汉唐敦煌古城的面貌。敦煌大方盘城，自从1921年英人斯坦因将其误断为河仓城后，竟左右舆论70年而未得加以纠正。李先生则不囿成说，从该城距州城里程、规模、破损程度、与其他古遗址的关系等方面，考出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而是汉代的昌安仓，纠正了传统的误说，使瓜沙史地这一重要问题得以澄清。

3. 对敦煌古塞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科学探讨。敦煌古塞城首见于后秦的《法显传》，复见于《晋书》及P.2005文书等典籍，因墙垣多圯，其历史面貌一直若明若暗，不甚了了。李先生不畏艰辛，风尘仆仆，寻迹觅踪，找到了至今仍残存的大段古塞城遗迹，并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就塞城的始建年代、四至、规模、布局、功用等做了科学论证。这一问题的解决，其意义并不只限于敦煌一地。李先生还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塞”的起源与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成为我国古塞城研究的开拓者。

4. 对于敦煌境内众多的名胜古迹作了系统的调查和考证。对敦煌郡城、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渥洼池、悬泉等著名古迹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相关遗迹遗物、历史和文化价值、有关诗文等，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并就前人搞错的若干问题，如敦煌郡城的确切地址、渥洼水的位置及“天马”佚事等，作了细致的辨析和重新考订，正本清源，纠正了

## 前言

古本敦煌乡土志，是指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号窟）出土的唐五代时人编撰的敦煌乡土志书。包括以下八种，今依其逻辑次第（不以编撰年代及抄写时日）为序，列其卷号卷名如下：

1. S.2593号《沙州图经卷第一》（原名）。

2.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移用卷名）。P.2695号残卷与本卷后部文字同，为本卷后部“甘祥瑞·白龙”条以下的部分，属本卷的另一残抄本，尾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今据其卷名，移置本卷。P.2695号写卷残存文字，仅为本卷的部分内容，故本书不再对其重复释录、笺证。

3. P.5034号《沙州图经卷第五》（拟名）。

4. S.788号《沙州志》（拟名）。

5. S.367号《沙州伊州志》（拟名）。本书专注于敦煌地理之研究，仅录出其关于沙州部分的文字并加以笺证。

6. P.2691号《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本卷较流行之旧拟名为《沙州城土镜》，余为改拟新名。

7. S.5448号《敦煌录》（原名）。

8. 散录1700号《寿昌县地境》（原名）。本件自莫高窟出土后，为敦煌祁子厚先生收藏。原件今不知下落，仅存吕钟氏录本及向达氏据窦景椿氏录本再次转录之本两种（说详本书《寿昌县地境》引言）。向达先生录本已于1944年刊布，后又经多人多次重刊，广传海内外；吕钟先生原录本与向氏转录本相异者多达30余处，而吕本仅保存于吕氏所著《重修敦煌县志》稿内，未经刊印，世人多未之见。本书乃取以刊布、笺证，以广流传。

以上八种，就其性质体例言之，除《敦煌录》一种而外，其他七种皆属系统记载敦煌州县沿革、城堡塞垣、山峦河渠、道路里程、关隘烽戍、寺观衙署、人文掌故等全面反映当地史地状况的地方志；《敦煌录》则有所不同，它并不全面反映敦煌史地状况，仅记乡土胜迹异闻，类似于乡土见闻录之属。前七种以记地为主，后一种以载事为主，两者性质体例显然有别。但后一种亦毕竟是专记敦煌乡土掌故的专篇，按诸史经籍志、艺文志之分类，仍应归入乡土志乘之列。故本书予以收录并加以笺证。

就各本记述之地理范围而言，可分为总记州和分记县两大类。

总记州者，指介绍沙州概况，如建置沿革、疆域变化、地貌特征、气候物产及本州突出的历史、人文内容。就今所见为：

1. 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
2. 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
3. S.5448《敦煌录》。

此外，S.367及S.788两卷，推测原当亦有总记沙州的内容，由于写本残泐，这部分内容已不复得见。

分记县者，为专记沙州所属敦煌、寿昌二县地理及人文状况者，就今所见有以下五卷：

记敦煌县者为：

1.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2. S.788《沙州志》内敦煌县之部。

记寿昌县者为：

3. 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
4. S.367《沙州伊州志》寿昌县之部；
5. 散1700《寿昌县地境》。

上述诸卷，无论记州或记县者，多是残卷，文字有残缺；仅《寿昌县地境》具首具尾，内容完整。然而该卷条目简省，记地既有所遗，记事亦非备载。

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卷子。关于此卷的性质及其拟名，将在该卷之《引言》中详论之，这里要指出的是，该卷绝大部分文字为记沙州之地者，但又兼有记瓜州之地者；条目简省不全，文字尤

其苟简，显然为五代时总领瓜沙二州之归义军地志之摘要略抄件。其祖本，当是《沙州归义军图经》（说见《归义军图经略抄》篇“引言”）。

《沙州归义军图经》，前部文字残失，后部所存文字既有属于沙州的内容，又有属于敦煌县和寿昌县以及瓜州常乐县及晋昌县的内容，条目及文字尽管十分简略，然而涉及瓜沙二州四县，反映了归义军统部的人文地理状况，是今存唐五代敦煌地区诸种地志残卷中记述范围最广的一种。尤以所记瓜沙二州境内诸山，多为各残卷所不见者，可以弥补各卷之残失，尤其可据以推补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之前缺部分。赖有本卷，我们才知道唐五代敦煌县地志中除记有三危山和鸣沙山外，还当记有军州境内诸山如黄釜山（疑又名黄谷山），猛水山、南口山、硖石山、会道山、石泉山、大乌山、石槽山、望山等九所山；该卷对这九所山所在位置的简要记述，为我们落实诸山之所在，考证诸山冲要作用、名称沿替及其历史意义，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自从汉武帝开设敦煌郡以来，敦煌很快成为远离中原的汉文化发达之区。这个地区幅员辽阔，农业繁盛，交通四达，贸易兴隆，造就出不少文人武将、高僧名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敦煌文化。今人盛称乐道的敦煌汉简、敦煌遗书、敦煌彩塑、敦煌壁画、敦煌佛教、敦煌变文、敦煌曲词、敦煌乐舞、敦煌医药、敦煌民俗、敦煌文学、敦煌书法、敦煌旅游……所有这些以敦煌冠名的学术命题，都是由于植根于敦煌大地而得名。关于这片土地，《汉书·地理志》以下诸史，及应劭、阚骃两部《十三州志》以下诸志，多有专门记述。然而率皆简略欠详，《十三州志》等书又早已散失（阚骃《十三州志》虽有辑本，亦是零星片断），故后人欲知敦煌古代之乡土旧迹者，每叹资料寡鲜。直到清朝末年，从敦煌莫高窟出土数万卷古代遗留文书之后，人们对敦煌的知识才渐渐丰富起来。其中反映敦煌地理及乡土知识最为系统而又集中的卷子就是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敦煌乡土志书八种。通过对这些乡土志书的研究，人们才对这块文化沃土有了较为丰富的知识，从而加深了对敦煌文化的理解。

本书所收古本敦煌志八种，是记载古代敦煌郡情况的基本文献。对八种古本敦煌志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敦煌历史、敦煌社会、敦煌经济、敦煌宗教、敦煌艺术、敦煌文学、敦煌民族、敦煌民俗等各个方面的理解